

云冈石窟佛教文化研究

□ 文莉莉

摘要: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佛教文化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化发展为出发点,结合南北朝佛教文化的对比性分析,重点研究北朝流行的佛教思想和修习理念,以及在云冈石窟洞窟结构及雕刻内容中所体现出独特的佛教文化内涵。

关键词: 佛教文化 石窟文化 云冈石窟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两汉之际,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佛教传入之时,社会影响力较小。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乱,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为了政权统治、安定民心,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有意提倡佛教,并与玄学、儒学结合,佛教发展在这一时期超过了道教,一时间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十六国晚期与北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少数民族深入汉地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先进的汉文化,从而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步伐。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佛教起到了积极作用,北方佛教便在政治更迭中加速发展。

北魏统一前,北方佛教有三个中心,即凉州、关中与幽燕。关中佛教以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为主体,凉州有昙无讖、玄高等著名高僧,幽燕聚集昙无竭、法度、昙弘等^[1]。北魏统治者鲜卑族在汉化的同时接受了佛教,道武帝曾致书泰山僧朗,并赠以礼物,“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2]。太武帝即位之初,也崇信佛教,经常与高德沙门讨论义理,也曾遣使到凉州召请昙无讖,但其后听从崔浩的劝告,信奉寇谦之的天师道,开始排斥佛教,终于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佛教遭受极大打击。太武帝去世后,文成帝即位,便下诏复兴佛法,认为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以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3]。于是下令诸州郡县建造寺院,百姓不论长幼,可自由决定出家。他先后任命师贤为道人统,昙曜为沙门统,并因昙曜之请开凿云冈石窟。此后北魏诸帝王大多信奉佛教,并大力支持建寺、修塔、开凿石窟,开展各种

功德活动。献文帝在平城建寺立塔,准昙曜请求,设立僧祇户与佛图户,促进北魏寺院经济的发展。同时,他对佛教义学也颇为重视,命中书、秘书两省与僧徒讨论佛教义理。从孝文帝开始,说法讲经与义理研究逐渐发展起来。

在统治者的推动下,佛教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魏代(包括东魏、西魏)皇家造寺47所,王公贵族造寺839所,百姓造寺3万多所,共有僧尼200万人^[4]。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度毁佛外,其他皇帝都大力提倡佛教,佛寺遍布全国,出家者多到惊人地步。与此同时,西行求经的人很多,大量佛经被翻译出来。据统计,这一时期,共译出佛经1000多部,3437卷。外国僧侣也纷纷来华,仅洛阳的西域僧人就多达3000余人,朝廷特别为之立永明寺,僧舍千余间。印度高僧菩提流支、昙摩流支、佛陀扇多、勒拿摩提等在永宁寺、白马寺翻译佛经,为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的经籍^[5]。

二、北朝佛教文化

魏晋以来,我国南北佛法修行方式有所区别,“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6],北朝重视禅修,南朝多谈玄理。北方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广泛传播,其原因在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支持,以及中国政治、经济、传统文化作用于佛教的结果。北朝佛教的发展规模空前,北魏(包括东魏、西魏)有僧尼200余万,在当时北方总人口中的比重惊人^[7]。同时佛教思想及其文化的发展也异常活跃,在功德思想的驱使下,举国上下大兴土木,修寺、造塔、开石窟、塑像、译经等等,企图通过这些行为,祈福、超度,求得往生极乐,如《金石萃编》中记载:“综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

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夥”^[8]。

北朝佛教僧团的修行,重视持戒、禅修。经过首次法难,佛教遭受严重打击,随着文成帝复兴佛法,以禅业见称的昙曜高僧,奉命兴佛造像,云冈石窟大量的千佛雕刻即是禅观思想的体现。其次,经历南北方沙门是否拜王的争论,北朝出现法果、昙曜这样的高僧,他们懂得佛教只有依附皇权才可平稳地发展,法果曾言:“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9],于是才出现了“拜君如拜佛”新的礼佛形式。再者,北方儒、佛、道都急于得到政权支持,三教矛盾斗争尖锐,最终酿成极端的灭佛运动。而正是此次法难,给予佛教反思并积蓄更大的力量,文成复法后以更快的速度博兴,同时造就了云冈石窟。

三、云冈石窟佛教文化特点

佛教文化是云冈石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禅观和礼佛观在石窟开凿设计理念中起决定性作用,两者同时反映了当时的佛教信仰观念及修行方式,共同创造了宏伟壮观的石窟佛国圣地。

(一) 礼佛观

早期佛教思想认为,佛陀是超人化的,没有哪种具体的形象能够表现佛陀。此时纪念佛祖释迦牟尼的,都是以象征的手法加以表现,如佛生前到过之处刻佛脚印,说法处雕刻法轮、宝座、莲花以及菩提树等,因此释迦灭度之后的五六百年间并没有佛像的流传。公元前327年希腊亚历山大入侵印度,古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随之传入印度大陆,于是产生了佛像。佛像,给信徒们带来一种新的信仰方式,也使“佛祖”更加真实化。于是造像之风盛行,也渐成系列,由一佛(释迦)到多佛,由佛像到菩萨像、罗汉像、弟子像等,逐渐成为佛教文化的主体之一。

西晋灭亡后,北中国陷入十六国混战,佛教在北凉以及后赵、前秦、后秦等国受到统治者的信仰和支持,发展迅速。南北朝时期,“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10],这是对太武帝平定凉州以后,把凉州佛教传入京都平城的描述。

佛像的大量出现,使佛教礼仪进一步完善。佛教传入汉地,其礼佛形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拜仪式,形成一整套严谨、隆重且有等级观念的礼制。佛教徒们面对庄严的佛像,都得恭敬地去礼

拜。北魏初年,僧人法果则以皇帝为当今如来,提出拜君如拜佛的礼佛观。《魏书·释老志》中记载,“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1]法果将礼敬佛祖与礼拜皇帝融为一体,使礼佛也有了双重意义。

北魏之所以造像,新的礼佛思想是关键。高僧赋予世俗政权以佛教神权,而统治者正是利用这种礼佛形式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部分高僧早已是北魏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昙曜在太武灭佛的劫难后造像,礼佛观是前提。礼佛与拜皇帝的双重意义,是促成云冈石窟造大像的契机之一。而云冈石窟的早期洞窟,昙曜五窟即是表现“拜君如拜佛”礼佛仪式的典型。

(二) 禅观

禅在佛教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释迦牟尼苦修时打禅静坐六年,悟道时在菩提树下入禅定坐了七天七夜,直到涅槃还是依托于禅定窟。可见佛陀在修行、成道以至涅槃大多采用了“禅”的修行方式。《涅槃经》记载“如来今住于拘尸那城,入大三昧深禅定窟。众不见,故名入涅槃。师子吼言:‘如来何故入禅定窟?’善男子,为欲度脱众生故。……为令众生尊重所闻禅定故,以是因缘入禅定窟”^[12]。可见,释迦牟尼将毕生的行动都寄托于“禅”。

“禅”是一种静心思虑的修行方式,禅修又称“思惟修”,是悟道成佛的渠道之一。佛教认为修禅的方法有世间禅、出世禅以及出世间上上禅。初学禅者先修世间禅的根本法,然后循序渐进,达到惑业断尽,得大菩提之净报。修禅业者可获得十种利益,即安住仪式、行慈境界、无烦恼、守护诸根、无食喜乐、远离爱欲、修禅不空、解脱魔网、安住佛境、解脱成熟。这十种利益是修菩萨行者在修行过程中万缘俱息、定性现前而获得的成果^[13]。修禅时需要选择山林幽静的地方,多在洞窟之中,采取静坐的姿势。坐法是“诸坐法中,结跏趺坐最安稳,不疲极。此是坐禅人坐法。……此是坐禅取道坐法。魔王见之,其心恐怖”^[14]。支谶《般舟三昧经》,谓欲生佛国,当念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此外《坐禅三昧经》教人由观形象而观法身。“是时便得见一佛二佛乃至十方无量世界诸佛色身。以心想故,皆得见之。既得见佛,又闻说法言。或自请问佛,为说法,解诸疑网。既得佛念,当复念佛功德法身,无量智慧,无崖底智,不可计德”^[15]。自东晋佛陀跋陀译

出《观佛三昧海经》以来,以观佛之相好,观佛之功德,而成就禅观之“见佛来现”,已颇为流行^[6]。

凉州在晋末为禅法兴盛之地,而北魏佛法随着太武帝灭北凉,徙国人于平城之际,也越加繁盛起来。北魏的禅业中,玄高不可忽视,他专精禅律,曾在长安受禅于觉贤,后师从于外国禅师昙无毗,妙通禅法。后投靠北凉沮渠蒙逊,颇受尊崇。北魏太武帝灭凉,玄高随至平城,或因牵连太子晃事件,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被杀,“玄高被杀时,门人见光绕高先所住处塔三匝,还入禅窟中。其平生所感神异尚多,具有仙道趣味”^[17],可见玄高禅法之精深。文成帝复法后,立即召回“以禅业见称”的昙曜,《高僧传》记载:“河西国沮渠牧犍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此应即北魏石窟寺僧,佛法再兴亦由于禅师也”^[18]。和平初年,昙曜奏请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19],文成帝欣然同意。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的高僧昙曜,将当时盛行的礼佛观与禅观巧妙结合,将帝佛之像与禅观修行相统一,既可以使信徒们礼佛陀形像,兼含礼拜皇帝之恭敬,又可使僧众修习禅业,由观佛入得三昧。昙曜五窟的佛教文化迎合了北魏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为佛教进一步发展找到了有力靠山,这也是北魏佛教能够达到鼎盛的重要原因。

(三) 译经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译经最多的时期,420—589年间南北八个朝代共有翻译佛经者67人,译籍750部共计1750卷。此次译经高潮发端于姚秦鸠摩罗什译经集团(402—413年),大师一生对佛教传播及其译经事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译经之风影响至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以及广州、豫章及沿江地区,所翻译的佛经内容也十分广泛。公元413年鸠摩罗什逝世;433年北京译经大师昙无讖被杀于凉州;439年沙门佛事皆俱东;446年北魏太武帝下诏灭法。此三十余年间,南朝翻译、义学俱称极盛。而北方除凉土外,黄河流域佛事寂然,译经事业也随之销声匿迹^[20]。到文成帝恢复佛法,沙门师贤受命为道人统。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为沙门统。因灭法运动中大部分经书被毁,昙曜集诸高僧在云冈石窟寺内翻译佛经,参加译经的有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人。据《魏书·释老志》云:“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21]。所译经典有《付法藏经》《付法藏因

缘经》《杂宝藏经》《称扬诸佛功德经》《方便心论》《八大乘论》《大吉义神咒经》《净度三昧经》《净土经》等,此外沙门昙度在平城讲经说法并著有《诚实论大义经》,昙靖著《提谓波利经》等。佛经中《付法藏因缘经》影响最为深远,其重要性在于,经中提出了释迦以前有六佛,而未来又有弥勒接替释迦继承佛法。佛统传承思想意在昭示佛教源远流长,遂致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的三世佛以及七佛组合迅速发展,成为北魏时期云冈石窟风靡一时的造像题材。

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文化现象,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发挥着或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北朝佛教注重实践,在佛教思想文化的引领下,修寺造像,开窟建塔盛行。在北魏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云冈石窟孕育而生,这是第一次由国家主持经营的大规模的石窟营造工程。云冈石窟所体现出的佛教文化与政权统治密不可分,既有利于佛教的发扬光大,同时符合北魏皇家的统治理念,由此创造了公元5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东方奇迹,它反映了当时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以及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1][4][7] 方广钊《中国佛教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2][3][9][10][11][19] 魏收《魏书》卷一一四,中华书局,2018年8月。

[5] 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2004年。

[6]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篇》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8] 王昶《金石萃编》卷二九,国风出版社,1965年3月。

[12] 昙元讖《涅槃经》卷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

[13] 赵一德《云冈石窟文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

[14] 龙树菩萨著,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七,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4月。

[15] 汤用彤《汤用彤全集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16][17][20]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18] 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10月。

(作者工作单位:云冈石窟研究院)